

自由與組織

自由與組織

吳之椿著

一、問題的背景

現在的世界與人生複雜極了。若問這複雜的情形，起於何時，其發展到現在遵循何途，就很難以一語來答復。雖然萬事都有起源，然而起源之前還有起源，每個時代無一不是承先啓後的樞紐。因此，我們討論一個問題，遂迫於挑選一個比較能劃時代而最便利的時代作爲起點，而詮釋其發展的途徑；這個起點仍然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約莫在六七十年之前，世界上各地方及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揭出信號的旗幟預示變遷甚或遽烈變遷之將臨；而這個時代並非甚遠；我們的祖父輩如果健在猶能記憶。但這些信號旗幟不會被人認識也未得人重視。因爲人類通常有兩種毛病，一是近視，一是惰性；因爲近視所以不容易看見這些時代的信號；因爲惰性所以不容易了解這些信號，更不容易去

努力以策應付這些信號所指示的危機。我們試一檢討這時候的人類生活，可以看得出不凡的事件，一幕一幕的展開。在政治方面，西歐有一八七〇—七一的德法之戰，因而在歐洲大陸樹立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而爲此後歐洲與世界的和戰增一有力的新因素。在北美洲，美國當其南北大戰結束之後，從事休養生聚，其經濟社會情形，步步踏入所謂現代的途徑。在東亞，中國承歷次外交失敗及太平天國散亂之後，開始向維新之路進發。其他，如日本，英國，俄國，以及義大利等國，亦莫不在此時期奠定其在現時世界地位之基礎。在經濟及社會生活方面，世界逐漸形成三大區域，其一，爲工業化之國家，如英，德，法，北歐之瑞典，丹麥，北美之美國等。在此等國家之內，因工業化之逐漸成熟，人口與財富增加，生活標準提高；因醫藥衛生之發達及生活利便之增加，使一般人民在大體上所得之福利亦遠較任何時代爲高。其二，爲尙未工業化之農業國家，如中國，印度，俄國，因經濟及政治之關係，不斷受工業國家之壓迫，其人民之生活亦因之而趨於凋蔽。其中蘇俄以革命而脫離此種壓迫，日本以特殊環境與時機幸而躋於所謂工業

國家之地位，而中國與印度至今日尙喘息於七十年來之情形，未有顯著之變更。其三，爲完全統治於工業國家之殖民地區域，如非洲，南洋等地，其民生之艱苦不言而喻，且無任何之保障。此三大區域，情形互異，壁壘森嚴。自經濟與社會生活之一方面而言，此時期第二區域內之農業國家企圖改進以達到第一區域之地位，亦卽此等國家解放運動之一重要方面。人類之生活，如僅就物質而言，在此數十年所經歷之變遷已較其歷史上任何同等時代爲大；而在多數工業國家之內，實亦較其歷史上任何千年之變動爲大。然而此種變遷不限於經濟與社會生活；其見於學術思想與信仰者，尤爲重大。

學術思想之變遷，在近數十年之成就，堪稱空前。無論就範圍方面，質量及方法，以及在社會上影響之大與速而言，在人類的思想史上，尋不到與之匹敵的時代。卽西歐歷史上有名的文藝復興，亦未可與之相提並論。文藝復興以文學美術爲主體，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二三百年的演進，其最大之影響爲對於以後之學術思想予以一般的領導與鼓勵。但一論其對於人民整個的生活，無論在物質或精神方面，實屬間接而遙遠。十九世

紀後半期以來，學術思想之發展，不限於一方，自純粹的自然科學，以及人類之自然史，人文科學與美術哲學，無一不備。且其方法之精密爲前人所不及，而其結論之準確可靠，在物質方面，可立時引用於利濟民生之大業，遂使數千年人類所懷想不得之澤被天下之理想，今以科學之昌明，開其端倪。至於在行爲與精神生活方面，科學之結論雖尙未能供給適宜之標準，但已提供豐富而不可忽視之參考材料。綜觀近數十年學術思想之變遷，備呈燦爛光輝之異彩；其影響所及，無國界亦無種界，社會中之各種人民，無不直接間接受其薰陶與激勵；此種影響極爲普遍深刻而迅速。吾人試一復按數十年來學術思想發展之途徑，可以窺見此種影響之由來，決非偶然。

一八五九年有兩種重要著作出版，此兩種著作範圍不同，性質各異，但皆可謂之劃時代之書；其一爲達爾文之種源論(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其一爲穆勒之自由論(J. S. Mill: On Liberty)。種源論謂之爲近代最重要之書籍亦非過辭，其影響至今不衰，雖其中之結論已經後來之學者提出修正與補充。自由論爲社會思想史上之一重要

階段，其作者爲吾人研究晚近政治與社會思想之起點。自由論與本文之題目關係密切，當屬顯而易見，但種源論對於討論此等題目如自由與組織之關係，雖不直接而顯然，但實極基本而重要，可以簡略一言。種源論從示對於社會思想與政治問題有一語之論列或暗示，自始至終未越自然界一步。僅就其對於人之研究而言，其功績在於提出實驗之證據，證明人與自然之體系，指示人在大自然中所佔之地位。此書出世以後，其一般之影響，使各門科學與學術，皆受其益而得以發展，其一種之特殊影響，在對於人類自然史之研究有莫大之鼓勵，並指示其發展之方向。吾人今日對人性與心理，遺傳，形態與生態，已在各方有長短不齊之成就，皆起源於此一書所賜，此乃學者一般公認之評語。此種成就距圓滿而可作行爲準則之境地尚遠，但其材料，凡研究社會思想的人，都不能忽略。研究自由問題，不能忽略其在人性與心理上的基礎，而組織與體用等問題的基本意義雖不開形態與生態。故種源論一書，對於社會思想，亦屬極關重要，其與自由論直接雖無關係，但間接有密切之聯繫。此二書同年出版爲偶然，然能同一時代出版，則非偶

然。自此以後，學術思想之進步，在各方面，如理化、生物、如人類學、語言學，如歷史、法理學與法律史，如社會學及初民研究，如哲學，心理等分途並進。在各國如英、法、德、美之學者聲應氣求，收效益宏，蔚為學術史上最光明之一頁。其中以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律史之發展，與此等重大問題如自由與組織，最為息息相關。梅因之古代法(Sir Henry Maine: Ancient Law, 1861)與泰勒之古代人類史(E. B. Tylor: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1865)等書，皆為此時期之極重要著作。此等著作，與達爾文、斯賓塞之書籍，以及赫胥黎之生理學(T. Huxley: Elementary Physiology)成為當時企圖依據自然科學之根據，解決社會政治問題之張本。一八七一年白芝浩之物理與政治(W.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實即根據上述張本為自由問題作科學上之辯護。此書之重要不在其細節，與所引之根據及所得之結論，而在指明人類學術思想之發展已至一階段，使人有勇氣以科學之工具，企圖解決如本文所提出之題目。故白芝浩之書在思想自由史上開一新紀元，而為當時有關學科作一總結。時至今日，吾人所知各

方面之知識，及科學上之根據，遠較白芝浩之時代爲充分與精確，吾人以爲此種材料爲研究自由與組織等問題之人所不可忽視，但僅憑藉科學以解決此種問題，今日仍非其時。繼白芝浩而起者，大有人在，但屬於較晚之一時期，所根據者有更豐富之材料與經驗，而所得結論亦遠較爲富於懷疑性與暫時性。

學術思想在此時期既在各方面掀起怒潮，其影響於人類之信仰，亦爲多方面的而有差別。昔日信仰宇宙創造論者，今多改從進化之說；向之堅信保守現狀者，現或變爲持改革之論；前此徘徊於漸進改良之境地者，今或成爲服膺激烈革命之徒。此種信仰動搖及信仰轉變爲十九世紀後半期之一重要特點，凡學說可引用以作支持成見或新見者，自哲學以至生物，無不被採納引用，以爲立論之根據。所謂社會主義學派之種種色色之人物與主張皆爲此一時代之必然的產物。自由問題爲社會與政治上之一種基本信仰，亦即人類有最悠久歷史之信仰，在此時期自亦不免於受新環境與新時代之侵襲而成爲重新討論，重新估計，重新說明之題目。格林(T. H. Green)在英國，普魯東(J. Proudhon)

在法國各根據其本國之經驗與其時代環境說明對於自由問題之意見。在此時期，有若干學者在學術上雖無永久的基本貢獻，但在思想史上佔有相當不朽之地位，確曾對於推翻舊信仰，建立新信仰盡過勞績，如赫胥黎其最著者。及至二十世紀之初年，思想與信仰上新舊之爭，除少數例外以外，大體上殆已有定局，而入另一時代。

人類之生活就全般而言，在以往數千年有史時代直至十九世紀之中，不會有甚大之變遷。各國有史之時期，長短不一，其所受四週天時、地利之影響，及與外來民族交換文物之經驗亦不一致。但大體上，各國在上古、中古及近代初期之區別較之現代爲小，其人民之物質生活，及經濟社會情形或農業或手工，要皆多少相去不遠，即以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相較，其區別亦遠不如今日之大。東西兩社會如今日之形成兩種似乎截然不同之典型，其成功乃在於近代。故就人類全體而言，除去少數區域，少數時代之例外，人類經過數千年之長期單調生活，除偶然來臨之戰爭或天災以外，甚少足以破其沉悶空氣之事件。此種單調、沉悶與安定之生活，至近代已逐漸消逝而進入所謂近代之生活；

至十九世紀此種人類從未習慣之近代生活已在許多國家，許多方面，呈其顯著之彩色。昔之簡單者，今日變爲複雜；昔之沉悶者今日變爲興奮與富有刺激性之生活；昔之安詳步調今日變爲緊張喘息之環境。昔日之安身立命之固定人生觀，今日變爲懷疑多變之態度。由昔日之生活，過渡至今日之生活，其間所經過之時間，就人類全體而言，可謂相當迫促。因此在今日之社會，發生多方面的不安與病態。人類在今日所享之福利誠然較之任何時代爲高；昔日所有公同之威脅，如天災，饑荒，疫癘已在甚多之地方可以絕跡；但現時人類生活於嚴重的病態狀況之下，無可爲諱。此種病態不限於一事亦不限於一國，就其最嚴重之症狀觀之，可以於下述三種現象窺見一斑。其一，在所謂現代生活最顯著之國家，人口之生殖率減低；且在一般國家之中，現時除瑞典京城一處以外，知識份子亦遠不如所謂低層社會生殖率之高。此種生殖率一般的減低，非任何已知之原因所能圓滿解釋。所得而揣度者，人類對於所謂近代之生活尙未能有充分時間之習慣而適應盡致。在動物之生態中，吾人早已習知，凡以人工方式干涉其習慣之生活環境超過

某種限度者，其生殖不繁。今日之近代生活環境，爲人類自造自設之樊籠。人類於短期之內，放棄其昔日之海闊天空牧歌式之自由生活，而進入自造之樊籠，當然不能逃脫動物生態學之公律，而開始付重大之代價。其二，近代生活之病態可見於社會上之各種不安定與擾亂；其中最著者，爲精神病之增加，家庭關係之不穩固，與週期循環式之嚴重失業等現象。在所謂富有近代生活之國家中，此種病態現象較之未有或少有近代生活之國家爲嚴重。而在同一國家之內，此種病態現象，亦以最富於近代生活之區域爲最慘重。凡此種種，充分說明人類尙無控制其自造之近代生活方式之能力。其中，如失業一項，使廣大之羣衆，生活於不安的陰影之中，尤爲近代生活之一種可怖之景象。其三，吾人今日已親身體驗，近代生活最嚴重之病態，足以產生最可怖之結果者，無過於國際間之戰爭。雖然人類之有戰爭不始於今日，但論其破壞之烈，與死傷之鉅，亦以近代戰爭爲最。今日除極權國家外，無不視國際戰爭爲應行避免之事；而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國際間之戰爭十九皆直接或間接受近代國家之指使或操縱。就自由與組織之標準而言

，人類生活如不能免除戰爭之威脅，不得謂之自由，但欲達到此項目的亦絕不能由於高揚和平旗幟。綜觀以上種種病態現象，皆人類生活所感覺之客觀的事實；亦猶人類生活所已享受近代生活之福利同爲客觀的事實。此種生活，爲禍爲福，或爲病態，或爲常態，但皆爲吾人思想，行爲諸問題所不可逃避的客觀的背景與環境。吾人之自由問題與組織問題，乃產生於此種背景之問題；故其問題之意義亦絕不能脫離此種背景而存在，亦不能脫離此種背景之時代而存在。自空間與時間而言，吾人處於如此之環境與如此之時代，故吾人之自由問題，必然有其現地現時之彩色，內容，特性，與意義；此爲吾人討論此種問題時所當注意之最要着眼。必須堅定把握此種着眼，然後所討論的結果纔有真實性與確切性而不流於空疏。

在並世的國家之中，今日之生活或爲病態或爲常態，頗有萬流歸於同一水平之感，或禍或福，最後將成爲人類公同一致之遭遇，除非吾人及時努力以求合理之決解。但在現時及近期之內，此等或禍或福之情形，相當穩固；但因歷史地理環境之不同，及其現

時經社會情況之各異，故在各國所表現之深淺程度，亦極不一律。如中國與美國或法國固然同處於近代之時期，然近代生活影響美法深而影響中國淺。中國大多數人民未受近代之福，亦未蒙近代之禍；生活標準較之多數國家爲低，但亦未有大規模之失業現象發生。就另一方面而言，中國仍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世界其他方面之一舉一動莫不影響中國，故近代之戰爭無論發生於何地，皆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或與其前途有重大之關係。在如中國之特殊情形及其所處之時代與環境之下，自由問題，亦必有其特殊之意義。總理遺囑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的國家現在要求怎樣的自由，中國的人民現在要求怎樣的自由，這個問題有其時代上民族上的特殊意義與解答。人類的自由史與經驗對於中國有甚多而寶貴之借鑑價值；但中國及其人民如欲獲得自由，必須遵循自己所開之途徑始能達到目的。如果歷史的意義是真實的，中國及其人民終必能遵循自己的途徑獲得自由。

二、自由與組織的功用

『人類有無自由』？數千年來空谷中響應着這樣的迴聲。

如果人類遇到了自由，能否有把握就認識？多少民族的興亡史都明示着這種認識的確不容易。西方的故事將自由神化，自由神頭戴光明的金冠，手擎自由的火炬，高照人寰，這種寓言亦是亦非。自由如果能像一座燈塔，自能在黑暗波濤之中指示航路；但是操舟的人能否看見燈塔就不一定是簡單，自己的視力，海上的雲霧障礙等等都牽涉在內。神化的作用所以盛行於古代，正為人生的種種困難問題無法解決；人類將自由神化，正見其為困難。事實上，自由如真理，認識不必容易，獲得必付代價。深思力索，忠於理想，把握現實，皆為此代價之一部份。人世的矛盾與問題太多，人類的經驗也太豐富而複雜。我們對於一些公同感覺到的問題，興趣不一，觀察不一，處理不一。或者迫於衣食，無一顧之閒暇；或者超然物外，置之不理。如生死問題是最普遍公同感覺到的問

題，我們對之的態度，不盡一致；僧夫俗士，貪生畏死，志士仁人，視死如歸。我們對於此種問題，雖依據多方面之經驗，作各異之解答，但並不妨礙吾人繼續維持共同的社會生活。所以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或者抱一種放任的態度。聽憑各人自擬其解答之公式，或者抱一種超然的態度，至老死而不予解答，皆無不可。惟有另外一種的問題，正因其是涉及社會內的共同生活，所以人類要生活，就不能抱着超然不理的態度；正因其密切涉及共同生活，所以人類既不能一日離開社會，就不能抱着放任各異的態度。自由問題正是這一類的問題。

自由問題所涉及的方面甚多。人人都有自由，因而立刻發生人已的權利問題；每國都有自由，因而立刻發生國際的關係問題。至於思想，言論，集會的自由，與政治，經濟，的自由，都是在人際社會與國際社會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我們自始必須認清自由的社會性，是其澈始澈終的真實性之所在；自由所以能成爲個人的，正因其是人間社會的；自由所以能成爲國家的，正因其是國際社會的。我們希望能從這一個觀念，對於自

由與組織的問題獲得一個比較圓滿的解答。我們對於人世的經驗越多，幾乎感覺到這是惟一可能的觀點。其他的觀念，越多越好，可供參考而不可偏廢，但如離開社會的觀點而執一以求，其結果必致於走進一條不通的死路。人類曾經走過這些路，最早的是哲學的路。人世的問題，哲學曾經給予不少的幫助與啓示，哲學至今仍爲人類最後的安慰。思想自由史上無數的哲學家讚美自由，然而此種哲學家所指示的自由之路，各爲一家之說，難爲百世之範。在個人自由方面如盧梭所指示者，在國際自由方面如康德所指示者，一時幾成金科玉律。但衡以今日之實際生活情形，或極不符合而已嫌陳腐，或仍空虛徒寄於理想。其他純從政治，法理諸觀點而得之自由概念，亦每嫌其偏於一端，而不與事實上的生活及人世複雜豐富之經驗圓滿契合。最近所選擇的自由之路爲自生物學之觀點出發，所得結論在大體上與以前之諸說皆相反。然吾人苟不能越過前提上之困難，則終不能承認其結論之正當。人與其他生物雖經證明屬於同一系統，但究竟各有其範圍；而此種區別究竟何在，吾人但知兩方森嚴之壁壘，未見完全明顯之界綫。故欲引用生物

學之公律於人世之社會，雖有舉一反三之益，終覺張冠李戴，過於牽強；惟生物學所能提供之材料，應存而不廢則無可疑。自哲學以至於生物，凡此種種曾經走過而未通達之路綫，俱留下不可磨滅之痕迹。此種地圖上之路綫痕迹，既各留有此路不通之指路碑，以指示後來者之方向；且可用爲開闢新路者，較正偏差之參考綫，其功用甚大，其材料可貴，值得尋求自由之路者時時之參閱。

自社會之觀念出發，爲人類開闢一條到自由的大路，今日仍在修築進行之中。此種觀點確有較其他觀點爲優長之處，可得簡單一言。其一。此種觀點企圖包括、溶合其他觀念之視綫，其所見者因此亦得以較純據於其他一點所見者爲全。其二，此種觀念之所見亦較純據某一點所見者，其抽象之成份大形減少，而客觀之成份大形提高。離社會而研究某一部份之活動，乃係基於一種假設之隔離；惟有根據社會各方面功能之同時活躍變動之全部基礎，乃能獲得關於自由問題之最真實而切近人生之概念。其三，基於此種觀點而得之結論，在應用上富於適應性與修正性，而不犧牲其基本地位。此種結論不存